



主 编 李亦菲
崔一心 况 琳

不敢读史

秦晓华◎著

1978

1999

1997

1985

2001

2002



华龄出版社

THE DANDELION SERISE

蒲公英教育丛书



对教育改革的最核心追问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人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明了，并以此断定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问题空间。本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追问的回应：从基层中来，到基层中去。

ISBN 7-80178-352-2 / G · 84

总定价：215.00元（全十册）

不敢读史

秦晓华 著

华龄出版社



作者简介：

秦晓华，男，1970年生，教育硕士，高级教师，现为江苏省徐州高级中学副校长，江苏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徐州市社会科学成果奖评委，徐州市青联常委，徐州市中语会副理事长，徐州市教师书友会副会长，《徐州教育科研》责任编辑，徐州教育学院、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师。在：

《中学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通讯》

《语文学习》

《语文月刊》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参考》等

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

CHOOBAR



责任编辑：闫丽
装帧设计：吕雪松

ISBN 7-80178-352-2



9 787801 783523 >

蒲公英教育丛书

主 编：李亦菲 崔一心 况 琳

副 主 编：钟国良 秦晓华 江兴代

陈明华 王宝丽 刘义民 刘培征

从基层中来 到基层中去

对教育改革的最核心追问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人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明了，并以此断定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问题空间。本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追问的回应：从基层中来，到基层中去。

之所以命名为“蒲公英教育丛书”，因为蒲公英现实，无论随风远足到何方，她眷恋的始终都是充满生机的大地；因为蒲公英坚强，看似弱小的生命，却蕴藏着一个伟大的梦想——大地。本套丛书也像蒲公英一样，根系土地、情归土地。

之所以命名为“蒲公英教育丛书”，还因为蒲公英的平凡，平凡到你看到她的时候，难免会想起自己；平凡到你阅读这套丛书的时候，总能阅读到自己的行进与坚守。

在我们看来，教育科研也应该具有蒲公英的品相。她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追求理想的教育境界；她又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扎根于现实的学区、学校、课堂；同时，她又特别需要真心、耐心、静心，唯书唯上没有教育科研、急功近利没有教育科研，浮躁喧嚣没有教育科研。

基于以上考虑，本套丛书所选择的内容，无论是对地区和学校对课题、实验和教研的总结，还是对个人对教育教学思想的探索，无不紧贴基层实际，无不深深地烙有实践的印记，力图展示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力图激发一串串深刻的思考。

愿“蒲公英教育丛书”能够见证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促进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

《蒲公英教育丛书》编委会

序

很喜欢东山魁夷《听泉》中的一段文字：“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日常的烦乱生活，遮蔽了它的声音，”“回想走过的道路，多少次在这旷野上迷失了方向。每逢这个时候，当我听到心灵深处的清泉，我就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标志。”东山魁夷在那篇文章中还说：“我也是这群鸟中的一只，所有的人们都是在荒原上飞翔不息的鸟儿。”从教以来，像鸟一样飞翔不止，难得有倾听内心的时刻。现在，总算有一个机会，可以反顾自己来时的路。

本书是我对自己 10 多年教改历程的反思与总结。共分四辑：第一辑以新课程为背景，着重探讨对传统的继承和赓扬、教师的精神成长、教材与评价改革等问题；第二辑收录的主要是我主持、参与的几个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侧重于教学策略与模式的研究；第三辑选入的教学案例，均是我执教过的有一定影响的公开课的现场实录；第四辑的内容是教材的微观研究，视角比较独特，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我以为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不仅关注重大事件，更关注教育生活中的日常细节，在课堂实录等部分还原了实际教学情境中的许多“琐事”，如某一教学设计的变更、某一教学灵感的突然闪现等，并对教学中的失误做了实事求是的回望与反省。很多东西谈不上研究，只能说是感受。唯其如此，正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个详尽而鲜活的现场和研究实体，正可以供学界作深入的解剖与批评。

著 者

2006 年 3 月

目 录

序

第一辑 纵古论今话课改

- 不敢读史——纵古论今话课改 (1)
- 乱云飞渡自从容 (9)
- 毛毛虫说,一点也不——一个青年教师的精神成长史 (20)
- 阅读 1984 (30)
- 关教材何事——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教材观 (33)
-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考试观 (43)

第二辑 困境与对策

- 语文课怎样才能上成有效的语言学习课 (53)
- “三读”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 (59)
- 语文自学辅导教学思想及策略研究 (67)
- 戏剧美学与语文教学 (110)
- 阅读的困境与对策 (120)

第三辑 教学现场

- 我教《驿路梨花》 (127)
- 我教《荔枝蜜》 (143)
- 我教《我与地坛》 (158)
- 暖意 (169)

第四辑 另一种读法

- “论语”音辨 (172)
- “侍坐”文化解读三题 (174)
- 《野草》阅读札记 (181)
- 《纪念刘和珍君》的另一种读法 (195)
- 《剃光头发微》之补注 (202)

- 后记 (207)

不敢读史

——纵古论今话课改

近几年,新课改春潮涌动,各类解读奇语喧哗。我却于热闹之中颇感寂寞,渐渐地竟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记得几年前作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时候,常去图书馆检索资料。与那些寻一方僻静之所眉目传情的大学生相比,我自诩是很认真且很虔诚的。因为离开校园这么长时间,重回校园几乎成了身体及心灵的双重回归。现在师资培训的方式很多,但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回到大学校园,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全面的浸润和滋养。这是题外话。去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图书管理员便给了我许多特权,尤其是晚上按规定是不准进书库的,但她却总是悄悄地开了后门放我一人进去。我颇感诧异,有一次忍不住委婉地问她其中的原因。她笑道,你看的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杂志几十年都没人翻了,书也需要知音。

这使我徜徉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间的手指陡然沉重起来。

时过境迁,这几年静观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场面,忽然又有了一种新的感悟:不读史也罢,因为一读之下便有比较,比较之下,便会有失语的危险。

一、话竟然可以这样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这是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纲要(试行)》里的一段话。“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为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事事都用你自己去理会,自己去体察,只是做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难处,同商量而已”。这是生活在公元1130—1200年间的南宋大教育家朱熹的一段话。我敢肯定,如果隐去他的姓名,任谁都难以想到近千年前就已有人将教与学的关系论说的如此透辟,而且说得是那样生动。近两年才在教育界精英话语中出现的“互动”、“探究”等字眼,在他那里以更为中国化、更有人情味的方式表达出来:“同商量而已。”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妨信手举他几则:

与朱熹同时代的二程在论学时有一妙喻:“与学者语,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他个卓立中途。”现在不少人对某教育家将教学比作教人行路的说法津津乐道,殊不知二程早有论及。

孟子是善用比喻、能近取譬的,他在论述教授的方法时说:“君子引而不发,可与人规矩,不可使人巧。”这里的“引而不发”与《学记》里的“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应是一义;妙的是后一句:“可与人规矩,不可使人巧”,与近人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今人所谓“与其给他兔子,不如给他猎枪”、“与其给他馒头,不如给他麦种”,与新课程三维目标之一“过程方法”等提法何其相似乃尔,只不过提得早了一些而已。

王充在批评那些绝无才情、照本宣科的教师的时候说:“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卹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让人忍俊不禁;王守仁在谴责传统教育方式重责罚而不重引导的弊端的时候说:“近世之训蒙稚者,自惟督以句读深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为图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敢见”,让人如芒在背。

蓝英年先生在论治学之道时曾说:“深入浅出是功夫,浅入浅

出是庸俗,深入深出尚可为,浅入深出最可恶。”当下,“以艰深抽象行文掩盖主体精神苍白的代言体论著”(张剑语)可谓多矣,“物自体”、“绝对精神”、“存在”、“文化本质主义”、“整合”、“理念”等似是而非的新名词被捋扯来捋扯去,正确的废话充斥各类文本。

不敢读史,无法相信,前人居然可以用如此简单的词汇陈述如此复杂的学理。

二、书竟然可以这样编

不管情愿不情愿,教改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教材的演变历史。教材问题向来是教改中最为敏感的问题。1997年语文大讨论即肇始于对原语文教材的猛烈批评,本轮课改也发轫于教材的革新。

清末以来有6种较有代表性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我们不妨倒过来观照一番:1996—1999年出版的顾振彪、顾之川等人编写的《全日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试验本)》(即现行高中语文教材)。其特点是:1、阅读和写作分编合册;2、形成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序列;3、文化内涵较深,文言文比例约占课文总量的60%;4、选文强调名家名篇;5、图文并茂。其他5种分别为1963年出版的由刘国正、张传宗编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1955年出版的由张志公、张毕来等编的初高中汉语、文学教科书;1946—1948年出版的《中等国文》;1935年出版的由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1908—1911年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可以说高中现行教材的所有特点在以上5种教科书中均已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来。仅以《国文百八课》为例,全套书采用分课混编法,共108课,分为6册(由于抗战爆发,仅出版前4册)。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目标,每单元有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并相互关联。选文有两大特色,一是语体文比文言文多(大致是3:2),二是应用文和说明文较多。语体文中记叙文居多,且多数是后世传颂的名家名篇,如《孔乙己》、《背影》、《最后一课》等,并配有大量插图。

我手头有一本刊印于 1931 年的《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里面收录了当时一些学校的国文教学资料。不妨抄录一段。以下是当时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孙怒潮编写的教材的概况：

教材编写：第一学年以养成作文技巧上的正确能力为标准，宜授以记叙文和论说文。第二学年以注重文学的基础及欣赏文学的能力为标准，选诗歌若干篇，谓之诗歌选；小说若干篇，谓之小说选；戏剧若干篇，谓之戏剧选。第三学年以注重学术思想养成或了解政治的人才为标准。选择学术思想文若干篇，谓之学术思想文选。

教学法：(子)应用的教学法，即我现用的教学法。例如《鼻子》(芥川龙之介)：(1)介绍作者事略；(2)介绍作者思想；(3)介绍作者著作及翻译作品；(4)讲授内容；(5)解析本篇结构(作图解)；(6)批评作风；(7)批评作者思想；(8)批评理想主义之不可行于现实；(9)理想主义之反想；(10)《鼻子》与鲁迅的《阿 Q 正传》之比较。(丑)作文练习(分三种)：(1)一小时为限，命题，堂上交卷。每学期至少举行二次；(2)三天为限，选题，一律交卷。每学期举行二次；(3)半学期为限，题材自拟，随时交卷。每学期举行二次。(寅)教学结果：学生反应颇佳。但因时间短促，尚未实际考查。(卯)学生课外读物：(1)必读书；(2)现在校中购备颇佳；(3)自备读物；(4)指导学生课外阅读。

由这段史料，至少可以看出：1、当时的教师有编写教材的自由；2、当时的教师已注意到按文字—文学—文化序列编排课文；3、当时的教师已注意到文选和写作的结合；4、当时的教师在处理教材的时候相当灵活，已能运用比较的策略；5、当时的教师已注意到作文形式的多样化，分命题、多题选一和自由拟题 3 种类型，而且时间不同，要求各异；6、当时的教师已经注意到课内外衔接问题，注意到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

不敢读史,无法相信,我们投入许多人力、许多功夫还没能完全统一的那些个认识,前人早已悄悄地付诸行动,并留给我们这页相当详实的记录。

三、课竟然可以这样上

1、养性

A)静站于地 B)师闭目,垂手静立,儿童效之

C)念修养词 D)唱修养歌

2、开始谈话:报告昨日各个所见的事情,多数儿童报告说鸡笼里死了一只小鸡。

A)讨论小鸡的死因:10个儿童先后发表意见,有的说是病死的;有的说是因鸡笼不洁而死的;有的说是被养鸡人抛弄死的;有的说是被球拍死的;有的说是因鸡笼太小给闷死的;有的说是吃得太多撑死的;有的说是给毒死的,不一而足。

B)教师总结小鸡的可能死因:鸡笼不洁,加之过于狭小。

C)讨论处置其余两只小鸡的办法:各人提出主张,教师主持表决。

D)教师总结处置办法:改造鸡笼。

E)大家同去鸡笼处,现场讨论如何改造。

F)讨论处置死小鸡的办法:学生提出埋葬。教师问:葬在何处?学生说:就近挖坑。教师问:离教室太近,气味太臭怎么办?学生说:可挖深点。教师问:认不出埋在什么地方怎么办?学生说:可以做个木牌。教师问:碑记如何写?学生讨论后回答:这是我们正级死的小鸡的坟墓。

然后讨论谁去葬鸡,谁去做木牌,谁去写碑记,分头实施。

3、结束本课:师生“同临其穴”,“凭吊”小鸡的坟墓。

这是发表于80多年前的《南师附小一月参观记》(黄成业、蔡挺生)中正级教学的一堂课的摘录。

我在不同的地方都讲过这个例子,并请老师们猜猜这堂课上

的情形可能发生在什么时代。几乎无人能猜对。实事求是地讲，即使是放在今天，这节课所表现出的实验勇气都是令人佩服的，所传达出的教学观念都是不落伍的。这节课显然受到了设计教学法及杜威实用主义教学思想的影响，它在对程序教学法进行反拨的同时，自身也不免出现不少缺陷，比如内容缺乏系统性，学生分工作业获得的经验不太完整等，但它所传达出的教学思想却具有当代性：强调情境与对话（这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核心），教学贴近儿童生活、学以致用（这十分符合素质教育所强调的培养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的要求），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互助合作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和新课程体系中的研究性学习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

不敢读史，无法相信。当我们还在为该不该把话语权、动手权还给学生的争论不休的时候，前人已经做出了如此大胆的尝试。

四、试竟然可以这样考

提到考试，真是欲哭无泪。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位校长说他曾带了30几名学生赴澳大利亚参加一个联谊活动。其中有一个节目是中澳学生手工制作比赛，组织方提供了一套材料和一份有关制作的说明书。当中国学生全部完成后，外国的多数学生还在捧着说明书看呢。他讲的这个例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并非动手能力差，而是我们没给他们提供动手的机会。为什么没给呢？因为有考试这只无形的手在牵制着我们的教学思想。

据说北京大学1932年的国文试题是这样的：整个试卷总共一页纸，共有6道题目。第一道题是要求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译成散文白话；第二道题是说出《文史通义》、《后汉书》、《论衡》、《说文解字》、《红楼梦》等10部书的作者或编者；第三道题是解释何为“四书五经”、“四部”、“三通”、“唐宋八大家”；第四道题是

举出五部秦以前的书；第五道题是解释“之”的不同用法和含义；第六道题是作文，要求在“艺术与人生”和“科学与人生”中选做一题。其“简单”如此！

西南联大 1946 年的国文考题就更“简单”得匪夷所思了，一共只有两道题，而这样的题目居然要从 3 万人里选出 1000 人来。这两道题目是：1、作文（文言语体不拘，但须分段，并须加标点）题目：学校与社会；2、解释下列成语的意义：（1）指日可待；（2）变本加厉；（3）隔岸观火；（4）息息相关。

相信，读到这些试题的人都有一种脑袋给砖头猛拍一下的感觉。这怎么行？我们已经习惯了“哈达卷”，似乎只有这样，覆盖面、区分度、主干知识、双基……这些因素才能得以很好的体现。

记者王丽也有这样的困惑，于是她煞费苦心地采访了当年使用过这些试卷的人，如宗璞先生、文洁若先生、英若诚先生等。英若诚先生的回答似乎很有代表性：“国文考试嘛，肚子里有多少东西就考多少。”

再来看看过去中学国文试题的情况。据谢泳先生介绍，他曾得到过一本 30 年代太原各中学的《报考指南》，几乎都以作文这种形式来考查学生的国文程度。而从命题情况看，多能结合学生实际和社会生活，如学校对于学生不外宽严二种，究竟何者为善，试各就所经历及意所推测，切实言之；如民国十九年的我；如善人者，不善人之师；如用极短的词句形容夏天的景致；如用“不但”、“而且”、“然而”联成一篇短小的文字等等。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有过一场大范围的争论，就是语文考试可不可以只考一篇作文。后来，上海首先废除基础知识的考查，仅考阅读和写作，也是引起了不少异议的。以史为鉴，真是不必大惊小怪。我以为试卷的长短、题量的多少、题目的难易并无多大意义，关键是能否考出学生的实际语文素养。

不敢读史，无法相信，前人竟用这薄薄的一张纸便轻松地超越

了我们苦心经营的长长的“哈达卷”的份量。

顾颉刚先生在二三十年代便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历史”的观点，所谓“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很有见地的，他提醒我们辨伪存真的重要性。历史不是过去了的生活全貌，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也说过：“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砌，也不是史实的罗列，而是人们对过去的一种记忆和解释。本文中所谈到的历史是那些对当代教育仍发生作用的有益的部分，也不排除历史中有糟粕、有垃圾。

还是应该读点历史的，以语文教育为例，虽历经了多年的嬗变，但正如一条流淌了多年的大河不会轻易改变其河道、流向一样，悠长的语文教育长河中一定会蕴藏着无数珍宝，一定会积淀着某些有着内在的恒定价值的东西，一定会存贮着“深澈猛烈的事实”（罗丹语）。

失掉了过去，也便失掉了现在和将来。